

·博士论坛·

## 试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区域“扰乱政策”

刘伟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20世纪 70年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总战略”。“总战略”在南部非洲区域层面体现在要将相关国家纳入南非控制的体系,而对拒绝接受控制的国家,南非则采取“扰乱政策”,对它们进行多种形式、不间断、低烈度的“扰乱”。南非的“扰乱政策”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阻碍了整个南部非洲区域的发展。但是,随着种族主义政权的垮台,南非的这一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关键词:**种族主义;南非;南部非洲;总战略;扰乱政策

南非自 1948年国民党上台执政后,掀起了全面推行种族隔离的浪潮,种族隔离制度逐步完善和系统化。但是,不断加强的种族主义统治并没有压制住黑人的反抗,反而推动了黑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先后获得独立,建立了黑人多数统治。但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进行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罗德西亚仍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纳米比亚则形同南非的殖民地,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仍非常强大。在此形势下,南非一是竭力维护在国内的种族主义统治和在纳米比亚的地位,严厉打击黑人民族解放力量;二是聚合南部非洲区域内的白人力量,支持罗德西亚白人政权,帮助葡萄牙镇压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民族解放运动;三是通过经济和武力结合的手段拉拢和打压区域内的黑人民族独立国家。此时,在国内,南非仍能实施较有效的控制;而在区域层面,南非与罗德西亚当局和葡萄牙殖民当局一道,继续维持着“白人至上”的优势。

但随着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立,南部非洲的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变化。因应变化的形势,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提出了“总战略”(Total Strategy),这一战略在区域层面则表现为“扰乱政策”。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南非对区域内的黑人独立国家进行包括经济打压和武装打击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扰乱,给这些国家乃至整个区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直到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消亡,这种扰乱才真正停止。

收稿日期:2009-04-25

作者简介: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导师为舒运国教授。

1968年,南非总理 B. J. 弗斯特(B. J. Vorster)在谈到南非、罗德西亚和葡萄牙的关系时说,“我们是好朋友,而好朋友不需要协议或者条约。好朋友在他们的邻居房子失火时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参见 Gilbert M. Khadiagala, *Allies in Adversity: The Frontline States in Southern Africa Security, 1975 - 1993*,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9。

## “总战略”与“扰乱政策”

1974年4月,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顽固进行殖民战争的政权下台,新政权宣布将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解放斗争力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终推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走向独立。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殖民统治的坍塌极大地改变了南部非洲的形势,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大大削弱,黑人民族主义力量则大大增强。与此同时,罗德西亚黑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正如火如荼,“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 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在纳米比亚境内外的斗争之火更是难以扑灭,其他独立六国也显示出争取南部非洲彻底解放的决心并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而在南非国内,“索韦托惨案”和黑人民族主义人士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被暗杀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强烈的谴责,也激起了南非黑人更猛烈的斗争。

南非白人当局意识到了形势的复杂性:一方面,国内形势日益严峻;另一方面,南部非洲也有可能陷入全面混乱,这将损害南非的经济利益,南非希望缓和与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但并不希望政治独立的黑人国家在宽松的环境下再取得经济成功,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削弱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基础。南非更不容许这些国家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简称“非国大”)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PAC, Pan -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反对种族隔离统治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争取纳米比亚独立解放的斗争。与此同时,南非还认为,南部非洲冲突中闪现着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影子,南非白人政权正面临着来自“境外力量”的“总屠杀”(Total Onslaught)的危险,“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 Frente para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 Movimento Popular para Libertação de Angola)的社会主义纲领和苏联、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就是例证。

针对复杂形势,南非制定了所谓的“总战略”。该战略是指“在一定的政策框架下整体利用国家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达到特定的国家目的的全面计划”,这一全面计划将政府、私人机构、外交、商业、工业、科技发展以及各类组织活动等全盘纳入战略考虑。总战略除了关注南非国内问题外,也立足针对南部非洲区域形势。

在南部非洲区域层面,“总战略”提出了力量平衡的问题。南非白人当局认为,区域内的黑人独立国家、刚刚取得独立并在南部非洲占有重要地位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正在赢得胜利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以及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南部活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将南非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同时还威胁着南非资本的扩张以及南非当局处理国内问题时的力量和效益。南非既不能对此不闻不问,也不能完全、高烈度地卷入冲突。因此,南非白人当局在“总战略”的框架下发展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南非试图以自己在区域内的经济支配地位为基础建立一个由其支配的“南部非洲国家集团”(CONSAS, Constellation of Southern African States)。参与这一集团,意味着依附南非,也意味着放弃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黑人解放力量,但是南非会给一些甜头,这是“胡萝卜”的一面;而对不肯合作者,南非则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和打击,这是“大棒”的一面,具体反映就是“扰乱政策”(Destabilization或 Destabilisation)。

关于“总战略”和“扰乱政策”,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南非民主进程的顿挫与延续——略论博塔的改革总战略》是比较新近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论述“总战略”背景时过分强调“索韦托暴动”对“总战略”出台的促进意义,没有看到当时南部非洲区域形势变化的作用;在论述“总战略”实施时则把重点放在南非国内,对“总战略”在南部非洲区域层面的体现没有详述。实际上,就“总战略”和“扰乱

Joseph Hanlon, *Beggar Your Neighbours: Apartheid Power in Souther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 - 8  
Glen Moss, Total Strategy, <http://www.disa.ukzn.ac.za:8080/DC/cnfl9791128.026.022.000/cnfl9791128.026.022.000.pdf>  
Dan O Meana, Destabiliz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Total Strategy in Total Disarray, *Monthly Review*, Vol 37 (April, 1986): 168  
潘兴明:《南非民主进程的顿挫与延续——略论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政策”,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南非和南部非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何丽儿就在《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一书以及《试论恩科马蒂条约之后南部非洲的国家关系》和《南非对邻国的政策及其趋势》两篇论文中有所论述。这些论述对总战略的概括比较全面,但仍不够深入,并且这些成果都是从南非总体政策着眼。有鉴于此,本论文重点探讨“扰乱政策”的实践及影响。

## “扰乱政策”的实践

种族主义南非的“扰乱政策”在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为军事性质,主要是由南非指挥的直接较大规模武装入侵、小规模突然打击、空袭、爆炸、绑架、暗杀活动和由南非支持的雇佣军打击、反叛组织颠覆活动;第二类为政治性质,主要是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派;第三类则采取经济手段,如破坏或封锁交通运输线路、不提供通讯中转服务、限制进出口、威胁驱逐劳工等。这三类手段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结合。比如,军事性质的扰乱活动往往采取多种手段,较大规模的武装入侵有时辅以小规模的突然打击、空袭或者破坏交通线的活动,有时则由反叛组织“打头阵”或“敲边鼓”;以经济破坏为目的而破坏或封锁交通的活动往往需要军事手段的支持,而军事打击在很多场合下的目标也正是交通运输设施;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派往往伴以支持他们的武装破坏活动,而像爆炸、暗杀这样的军事活动也常常是政治上支持反对派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满足执行“扰乱政策”的需求,南非对武装力量进行重组,力求使之满足三个条件:灵活机动,能迅速对有关国家实施打击;增强防暴镇反能力;将相关国家反叛势力和雇佣军纳入本国军事体制。

“扰乱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考虑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对安哥拉,南非长期采取较高烈度的军事手段:直接军事入侵并且占领安哥拉土地、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 IIA, 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和空袭等,使安哥拉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活动频繁以及安哥拉具备非常大的经济潜力。南非先是以打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名入侵安哥拉,随后又展开对安哥拉的经常性武装打击。南非的目标主要是安哥拉的重要经济地区和政府军设施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办公点和难民营。自 1980 年至 1983 年,南非每年都发动对安哥拉的武装打击,占领了安哥拉南部的一些地区。1986 年,安哥拉总统在第 41 届联大上发言时说,南非在近四年里侵犯安哥拉领空达 4000 次,轰炸 186 次,大规模地面进攻近 100 次。此外,南非还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袭击破坏安哥拉的重要经济地区及设施,安哥拉的钻石矿业中心、输油设施以及横贯安哥拉连接赞比亚和扎伊尔至大西洋的本格拉铁路长期笼罩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南非打击的阴影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南非对莫桑比克的扰乱活动最突出的是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MNR, Mozambique National Resistance)。由于莫桑比克和罗德西亚接壤,且一直人员来往频繁,在殖民统治被推翻之前,葡萄牙和罗德西亚政府联合建立了一批组织,用于镇压在两地活动的民族解放力量,“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该组织隶属罗德西亚中央情报组织(Rhodesia Centr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由罗德西亚空军特别行动队训练,是罗德西亚用来在莫桑比克搜集情报的机构,后来又专门负责破坏莫桑比克的交通线。1980 年津巴布韦诞生后,这一组织旗号不变,但却转受南非军事情报部(South Africa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统辖,在南非的德兰士瓦设立基地,接受“南非国防军”(SADF, South Af

葛信、何丽儿:《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何丽儿:《试论恩科马蒂条约之后南部非洲的国家关系》,《西亚非洲》,1986 年第 5 期。

何丽儿:《南非对邻国的政策及其趋势》,《西亚非洲》,1988 年第 5 期。

ANC, Apartheid Destabilisation: Pretoria's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http://www.disa.ukzn.ac.za/index.php?option=com\\_display&recordID=boo00000000\\_026\\_021\\_000](http://www.disa.ukzn.ac.za/index.php?option=com_display&recordID=boo00000000_026_021_000)

葛信、何丽儿:《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第 162 - 163 页。

关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建立问题有一些争议,详见葛信、何丽儿:《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第 181 页。关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有关活动也可参考此书,第 181 - 185 页。

rican Defence Force)派员训练,继续在莫桑比克活动。除了支持代理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外,南非还多次从空中和地面直接袭击莫桑比克,尤其是袭击马普托和贝拉港口的设施。从比勒陀利亚通往马普托港口的铁路是布尔人早先修建的,一直由南非控制,在马普托港口的工作人员中有南非人,南非有时也采取禁止运输列车开往马普托和撤走港口南非工作人员的手段。莫桑比克对这两个港口的收入有一定的依赖,南非的行动必然会给莫桑比克的经济造成影响。此外,南部非洲国家在寻求摆脱对南非的交通运输依赖时,莫桑比克港口的意义非常重大。南非对莫桑比克港口的扰乱行动实际上也给其他南部非洲国家带来了冲击。

南非对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的扰乱可谓“得心应手”。这三个国家与南非近在咫尺,莱索托更是被南非四面环绕,斯威士兰也是被三面包围;三国还在产品出口和进口上依赖南非,并且有很多人在南非打工,这些人的收入对三国非常重要;此外,三国还是南非主导的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 Southern African Custom Union)的成员,而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同时还是“兰特货币区”(RMA, Rand Monetary Area)的成员。

博茨瓦纳是“前线国家”创始国之一,长期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班图斯坦”阴谋,坚持接纳南非黑人难民。博茨瓦纳也是“BLS国家”中唯一领土较大、实力较强、能与南非进行一定抗争的国家。南非对博茨瓦纳长期实行包括直接军事入侵、小股军事袭击、空袭以及经济打压等扰乱活动,试图逼迫博茨瓦纳停止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承认南非的“班图斯坦”,停止容纳“非国大”人士和黑人政治难民并与南非签订所谓“互不侵犯”条约,但博茨瓦纳顽强地顶住了压力。为此,博茨瓦纳“从1985年1月13日至1989年1月14日遭受了来自南非国防军的20次直接打击或破坏、37次较小规模袭击或跨境开枪射击平民以及23次领空侵犯”。此外,南非还通过抽回在关键领域如矿业的投资、限制博茨瓦纳钻石的出口、限制博茨瓦纳从南非或通过南非港口进口食品等经济手段打压博茨瓦纳。

南非对莱索托的扰乱,目的主要是迫使莱索托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南非难民进入、驱逐“非国大”人士、不与特兰斯凯班图斯坦的领导人接触。此外,南非还希望颠覆反南非的乔纳森政府而代之以一个亲南非的政府。南非支持莱索托流亡的反对党“巴苏陀大会党”(BCP, Basotho Congress Party)的军事分支“莱索托解放军”(LLA, Lesotho Liberation Army),定期在马塞卢实施爆炸、袭击政府官员、攻击警察局等。1982年12月,一支“南非侦察突击队”(South African Reconnaissance Commando)亲自出动,夜袭在马塞卢停留的“非国大”人士,导致包括莱索托平民在内的42人死亡。除了军事手段外,南非还曾封锁莱索托边界,限制商品和人员进入莱索托,并威胁驱逐在南非工作的莱索托人。1986年元旦,南非全面封锁莱索托边界,由南非军队把守莱索托对外通道;1月17日,反对乔纳森政府的莱索托军事部门代表与南非进行会谈;1月20日,莱索托军事部门发动政变,推翻了乔纳森政府,南非也随即解除了封锁。

斯威士兰对南非的态度一直比较摇摆。1968年独立后,斯威士兰一度对南非比较友好;到70年代末,斯威士兰开始疏远南非,后来还加入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并于1981年4月邀请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莱索托元首访问,共同发表了批评南非的声明。但是南非很快即利用斯威士兰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控制了斯威士兰,并以两小块土地换取了斯威士兰的屈服。但即便是屈服,南非也没有放弃在斯威士兰领土上开展军事打击、绑架、暗杀等行动。

津巴布韦解放后,黑人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地位。但是,津巴布韦白人力量仍非常强大,而且很多白人与南非联系密切,一些白人公司在南非有投资,还有一些白人公司本来就是南非总部设在津巴布韦的分支。津巴布韦试图摆脱对南非的交通依赖,希望更多地使用马普托和贝拉的港口,但是白人对此并不热衷,他们更乐于使用南非的交通设施,况且一些白人还对这些交通设施有投资。南非一方面向津巴布

---

即所谓的“BLS国家”。“BLS”是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的简称。这三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南非较为密切的联系以及一些类似的特征,因此有人常将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考察。

葛佶、何丽儿:《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第205-206页。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1.

Robert Davies and Dan O'Leary, 'Total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n Regional Policy Since 1978',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April 1985): 200.

韦白人进出口商提供优惠,另一方面还破坏津巴布韦通往莫桑比克港口的交通线,吸引和促使他们利用南非的交通设施。南非还支持津巴布韦的反对派反对执政的穆加贝,并为反对派建立电台,重点对穆加贝支持势力较弱的马塔贝莱兰省进行颠覆性宣传。

赞比亚长期支持南部非洲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南非对赞比亚的扰乱除了通过空袭外,还通过嵌插于赞比亚和博茨瓦纳之间的纳米比亚卡普里维狭长地带(Caprivi Strip)直接进入赞比亚南部射杀平民、焚烧村庄等。此外,南非还支持一支被称作“姆沙拉团伙”(Mushala Gang)的力量对赞比亚西部进行骚扰。“姆沙拉团伙”的头目亚当森·姆沙拉(Adamson Mushala)原是赞比亚西北省的一个丛林保护区的护林员,他带领一群人在1973年时接受葡萄牙的训练和资助后为其效力。这支力量在安哥拉独立前夕被南非“接管”,并在南非国防军设在纳米比亚的军事营地接受训练后返回赞比亚西北省。姆沙拉团伙长期实行抢劫和威吓当地人的活动,直到1982年姆沙拉被击毙。南非还操控主要在莫桑比克活动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进入赞比亚东部开展扰乱活动。此外,由于赞比亚极端依赖铜出口,南非更是想方设法阻断赞比亚铜出口的交通线,在西面破坏本格拉铁路,在东南面则破坏通往马普托和贝拉港口的公路和铁路。

坦桑尼亚虽然在地理上常被归于东非,但尼雷尔总统却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历史经济联系较少,且距离较远,坦桑尼亚被南非扰乱的程度也较轻。除了有小股“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力量进入坦桑尼亚南部活动外,南非基本上没有直接打击坦桑尼亚。但是,为了支持莫桑比克抗击南非的进攻和扰乱,坦桑尼亚也在经济、人员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

### “扰乱政策”的影响

“除了在国内的邪恶的暴力和压迫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也给邻国人民带来了同样邪恶的暴力和压迫,这造成了无法言述的社会经济破坏,并且正在粉碎区域快速发展的希望”。这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为《种族隔离的恐怖主义:关于“扰乱政策”的报告》一书作序时所说的一句话。的确,南非对南部非洲的扰乱,不但给相关国家带来了恶性的影响,也损害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首先,南非的扰乱活动给相关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南非的扰乱活动常以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中心、交通线为目标,从安哥拉的石油产地到莱索托的旅游景点,从本格拉铁路到马普托港口,南非的扰乱给这些国家原本就脆弱单一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除了这些直接损失外,南部非洲相关国家为了应对南非的封锁和扰乱也付出了额外的成本。一段时期里,赞比亚的铜出口不得不依靠昂贵的空运;起初并没有正式武装力量的博茨瓦纳也不得不建立武装力量,还不断扩充警察队伍。这些行动抽走了它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建设发展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南部非洲相关国家在不得不花大力气应对南非扰乱的同时,也付出了极高的机会成本,流失了很多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的时间和机遇。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底为止,南部非洲相关国家因南非扰乱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至少450亿美元。其中安哥拉损失最重,大约为220亿美元;莫桑比克次之,约120亿美元;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分别约为30亿美元、70亿美元和5亿美元;坦桑尼亚开展军事行动和保护难民的成本也有数亿美元。

其次,南非的扰乱活动还给相关国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很多人流离失所。从1981年起开始计算,南非在区域内的扰乱活动导致至少150万人死亡。南非大规模军事行动和空袭不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像小股袭击、爆炸、绑架等这样的行动虽然打着对付“非国大”人士的旗号,但总是难以避免殃及平民。除了直接导致的伤亡外,扰乱行动导致的农作物毁灭、医疗设施破坏等也造成了大量人员因饥

Robert Davies and Dan O'Leary, Total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n Regional Policy Since 1978,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April 1985): 203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Foreword by Kenneth Kaunda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p. 10.

饿或疾病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莫桑比克的医疗服务体系在 1980年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医疗设施大幅增加,国民免疫接种率达 95%,还培养了数百名接生员和妇幼卫生护士。但是,南非的扰乱使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莫桑比克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198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每天因基础医疗设施被战火摧毁而无法提供基本免疫服务和医疗救治导致的儿童死亡数几乎与每天被射杀人数相等。此外,南非的扰乱活动还导致南部非洲出现大量的难民,约有 220万难民在国内流离,约 120万难民跨国界颠沛,其中还有很多儿童。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得到相关政府和国际社会的紧急救助,而大部分则只能听天由命。

再次,南非的扰乱活动损害了南部非洲区域各国间的关系。一方面,南非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了损害。“新南非”建立后,南部非洲相关国家还是对它抱有疑虑,惟恐它利用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控制和压迫各国,这是与长期遭受南非扰乱的历史记忆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南部非洲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龃龉。本来,南部非洲区域内的黑人独立国家组成了“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s)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但是,在南非的扰乱和打压下,一些国家有时不得不放弃作为组织成员应担的责任而委曲求全与南非合作,从而损害了这些国家间的关系。

此外,南非的扰乱活动还给南部非洲的生态造成了损害。南非在占领控制安哥拉南部期间,砍伐了当地大片的柚木林,并猎杀了约 10万头大象。木材和象牙被运回南非国内,作为高价商品出卖,弥补在安哥拉行动的军费。“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在莫桑比克活动期间也大肆猎象取象牙出卖。1987年,在“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多个营地发现了总共 19 700支象牙。在南罗德西亚生活多年、写有多部非洲题材作品的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中说:“在莫桑比克的丛林中再也没有任何野生动物了,打仗的时候都被赶尽杀绝了。”

“种族主义南非对区域的扰乱意味着一种很少有外人能够知道和理解的大毁灭。精神和身体上的伤痕是深刻的。有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只有战争和恐惧,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治愈。前线国家因南非扰乱带来的经济和军事成本几乎是这些国家全部外债的三倍”。而“非洲政策信息中心”(APIC, Africa Policy Information Center)发布的一份文件则说,种族主义南非对区域欠下了巨债,新南非必须双倍偿还。

## 结语

南非的“总战略”在区域层面的反映是要求南部非洲黑人独立国家服从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利益,“扰乱”是其手段之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于 1984年被迫分别与南非签订“互不侵犯”的《卢萨卡协议》和《恩科马蒂条约》之后,南非一度认为“总战略”在区域取得了胜利,认为其他黑人独立国家也会效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与南非妥协。但事实上,只要种族主义政权依然存在,黑人独立国家和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最终,撕毁协议的还是南非,它很快又展开了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扰乱。

南非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对整个区域进行扰乱,力求迫使黑人独立国家放弃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敌对,放弃对南非和纳米比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但是,南部非洲黑人争取全面民族独立解放的决心和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国际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

---

J. L. Cliff & A. R. Noomahomed, The Impact of South African Destabilization 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 Mozambique, *Journal of Tropical Pediatrics*, Vol 34, Issue 6 (December 1988): 329.

Mamphela Ramphela and Francis Wilson, Children on the Frontline: The Impact of Apartheid, Destabilization and Warfare on the Children in Southern and South Africa,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January 1988, p. 20.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p. 11.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p. 11.

[英]多丽丝·莱辛著,叶肖等译:《非洲的笑声:四访津巴布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26页。

Phyllis Johnson & David Martin, *Apartheid Terrorism: The Destabilization Report*, pp. 11 - 12

APIC, Southern Africa: Apartheid Debt, [http://www.africa.upenn.edu/Urgent\\_Action/apic\\_72798.html](http://www.africa.upenn.edu/Urgent_Action/apic_72798.html)

“非国大”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斗争的日益激烈，南非的政治、经济以及白人的士气均受到影响，一批白人有识之士认识到顽固不是办法并开始寻求与黑人妥协。1990年，纳米比亚获得独立；1994年，南非举行多种族大选，“新南非”诞生。随着种族主义统治的寿终正寝，“扰乱政策”也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宋 鸥

## An 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of Destabilization of the Racist Regime of South Africa

L I U W e i - c a 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racist regime of South Africa developed the Total Strategy in 1970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sought to bring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into a system dominated by South Africa. It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destabilization which includes various uninterrupted and low intensity disturbances to deal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refused its domination. Destabilization brought about huge loss for those countries and also hindere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Apartheid rule, the policy of destabilization failed finally.

**Key words:** Racism; South Africa; Southern Africa; Total Strategy; Destabilization

(上接第 53 页)

## On the Policy of Four - Social - Estate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L I D a - l o n g

(Journal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 social - estate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ivision of people into four kinds meets the need of grand unification to some extent on the one hand, and it's a recognition of the outcome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Song,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cy resulted in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ationalities, and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national amalgamation to a greater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most scholars' opinion that the policy of four - social - estate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has the implication of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seems incomplete.

**Key words:** Yuan Dynasty; Mongols; Semu people (色目人); Han people; Southern men; ruling policy